

第三章 台灣第一所音樂資料館的設立與演變

有關台灣地區過去曾經對外開放營運的音樂資料館的文獻資料極為稀少。因此除了詢問師長或從相關學術領域尋找當年的一些報刊、雜誌外，訪問當時各館的館長與相關人士為本論文成文的一個重要關鍵，並能從訪談中獲悉有關該館的相關資料。

「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為台灣地區第一所成立之音樂資料館¹，其發展概況大致如下：史惟亮於民國五十四年在救國團所屬之台北學苑成立國內第一所音樂圖書館，是當時音樂資料最多之處所，次年二月發行「音樂學報」，發行十二期停刊。民國五十八年音樂圖書館也因管理經費無著，遷往台北市四維路史惟亮住處，成為私人音樂圖書館。民國六十六年史惟亮逝世後，音樂界集資成立「史惟亮紀念音樂基金會」，其所屬之「史惟亮紀念音樂圖書館」於民國六十八年對外開放，由其子女掌管（彭聖錦 1997：127），繼續音樂圖書館的工作，民國八十五年起結束對外開放。



圖3 設於台北學苑內之「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功學月刊 1965：20)

以下各節將對台灣地區的第一所音樂資料館，從其設立背景、發展歷程以及它的設立對音樂界的影響等層面，將所蒐集到的文獻資料、訪談紀錄，以文化研究的批評觀點，作出整理分析。

¹ 史惟亮留歐回國後，建立了國內第一座具有學術性的音樂圖書館，不但為音樂界開創了一個新的研究環境，而且提供了青年學子豐富的音樂資料（康謳 1978：109-110）。當時的報紙曾作如下報導：旅奧青年音樂家史惟亮，定二月十日自奧國取道香港返國。史惟亮返國後，有一項創舉，他決定要在國內創辦一所音樂圖書館。音樂圖書館目前在國內尚無此種設備（聯合報 1965/1/3：第 8 版）。

第一節 成立之時代背景

是怎樣的背景促成史惟亮在返國之初隨即在國內成立第一所音樂資料館呢？茲從當時的文化、教育、社會背景及創辦人史惟亮的理想，分析如下：

一、文化背景

（一）全球音樂文化之西化

近百餘年來西方文化隨著船堅砲利、經濟優勢，強勢的進入世界各地，音樂作為文化的一環，也無可避免的以文化霸權的姿態，進駐各個國家。以「歐洲中心論」為核心的文化價值觀，表現在音樂方面即為「歐洲音樂中心論」；認為歐洲近現代音樂是人類最發達、最美好的音樂。因此幾乎所有國家的音樂教育都是以西方音樂理論作為主體，台灣自然也無法置身其外。一股西樂風的學習潮瀰漫了整個世紀，相對的，西方音樂學習環境的迫切需要，更加速了相關機構的設立。

（二）近代中國音樂之西化

從洋務運動到維新變法，留學生遠赴遠東、西洋者日眾，知識份子的視野也逐漸擴大；由於改革的需要，他們也樂意接受西方文化，不再深閉固拒；因此，西洋文化大量傳入中國（王聿均 1991：3）。而正當五四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之際，在文化求新、求變之中，音樂亦不例外。。

一部中國音樂的發展史，可說是傳統音樂和外來音樂由衝突到融合的過程，從隋、唐以至元代，西域音樂和回教音樂陸續與中土音樂相接觸，就是明顯的例子。然西洋音樂之流入中土，以十九世紀末葉到二十世紀初期，來勢最為猛烈，這與當時政治、社會之劇變有關，而西樂藉基督教會、西式軍樂和新制學堂三大媒介傳入中國社會。因此西洋音樂在近代中國社會逐漸佔據重要地位，是一種「社會現象」，不是「音樂現象」（韓國？ 1990：3）；說得更具體一些，大量的引進西樂，是與在外侮的侵迫之下，國民力圖發憤自強有關（王聿均 1991：34 - 35）。

西方音樂伴隨著西方的堅船利炮、先進的科學技術、傳教士以及西方的整個意識形態到中國來。當我們在接受西方音樂時，音樂史觀和音樂價值觀沒有進行

文化差異的認同，因此在音樂教學、理論、美學、創作等方面基本上以西方為準則，沒有自己的立足點（管建華 1995：282）。

二、教育背景

（一）日據時期台灣地區音樂教育之西化

在台灣地區，西洋音樂自數百年前於荷西時代即隨著西方傳教士進駐台灣，最早人們所接觸的僅止於天主教的祭儀音樂——格里哥利聖歌（Gregorian Chant）。但是因為西班牙、荷蘭人在台灣佔據的時間太短，因此所傳播之音樂無法流傳。而西洋音樂在台灣之傳播紮根，應該起源於基督教長老會在台的傳教。到了日據時代，日人設立公學校或師範學校，全盤實施西洋音樂教育，引起台灣居民對西洋音樂的重視與愛好，從此在台灣才有學習音樂的專門人才（陳碧娟 1995：1 - 2）。

（二）光復後台灣地區音樂教育之西化

台灣光復後承續日據時期的成果，西方音樂更蔚為一大主流而穩固地成長。光復初期承繼日據時期所奠定的基礎，開始設立音樂學校培養專業音樂家，加上國民政府遷台，大陸音樂家的參與，使得當時台灣新音樂²呈現了多樣的風貌。而新音樂則普遍在台灣推展開來，無論是教育制度或音樂創作，幾乎全盤西化（陳碧娟 1995：302）。當時台灣的專業音樂教育制度在內容方面：

- （1）以西方古典音樂為主要教材，缺乏民族音樂的教育。
- （2）課程內容保守，缺乏世界性的音樂觀。
- （3）與社會音樂潮流脫節，無法配合現代科技的各類新音樂。例如：電子電腦音樂；音樂在廣播、電影、電視方面的錄製技術；電氣、建築音響等音樂工學；商業性的應用音樂等。

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是本省最早設立的唯一音樂高等學府，其成立之宗旨，

² 指台灣從近現代之後，因西方強勢文化的擴展，人們接受西洋音樂後所產生而發展的西式新音

雖在中學音樂師資的培養，但也自然集中了當時最優秀的音樂家。在學生方面，因為它在光復初期，是惟一培養音樂專才的園地，有志於從事音樂工作的青年便集中投身於師大音樂系。它成為光復後第一代新音樂家的搖籃地是自然的情形。因此台灣新音樂的運動便是由他們留學（以歐美為主）歸國後展開的（許常惠 1991：310-312），而「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創辦人史惟亮即是師大音樂系第一屆畢業生。

三、社會背景

（一）西方音樂環境之缺乏

台灣雖然自日據時期開始至光復初期，整個台灣的音樂教育是以西方音樂教育體系為主體，但不管是在學校或是社會方面，西方音樂的學習環境都顯得不足。茲從學校與社會方面，分析當時西方音樂的學習環境：

1. 學校音樂環境

台灣光復後，第一所音樂學府-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即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前身）成立於民國三十五年八月，當時設「音樂專修科」，但僅招收一屆的學生，於民國三十七年八月，設立「音樂系」，從此之後才開始在台灣本土培養專業音樂家，然而在「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成立之前（即民國五十四年之前），只有台灣省立台北師範學校、政工幹部學校、國立台灣藝術學校、中國文化學院等大專院校設有音樂科系。在中小學方面，民國五十二年以來，只有音樂課之設立，為普及音樂教育，民國五十二年開始，台北縣私立光仁小學才開始開始設立音樂班（陳碧娟 1995：56-57），因此當時在學校方面，西方音樂師資的培養顯得不足，對於基礎教育中的音樂教育，更無法發揮顯著的作用。

2. 社會音樂環境

「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創辦之時，史惟亮認為在臺灣一年聽不到幾場像歐

樂，此類音樂的普及程度，有後來居上的趨勢，並且成為台灣音樂發展之一大特色。

洲水準的音樂會，沒有能與歐洲水準相銜接的技術，沒有傳播知識最重要的書譜，沒有音樂出版，沒有音樂圖書館，因此認為我們需要一座可以使音樂家們進步的圖書館，它應該包括中國和外國音樂歷史上的名作，古代的和近代的文獻及大量的音樂知識叢書。而且指出我們所需要的環境不僅是死的圖書館和唱片室，而更需要活的社會音樂活動的環境，樂隊、合唱團、音樂會、報紙上的音樂專欄，它們對於音樂藝術的發展，比學校教育和圖書館更能發揮積極的推動力量（史惟亮 1965：18-21）。

再由表 1 顯示，民國四十九年以前成立，且民國五十四年時還存在，以推展西方音樂為主之各重要機構或演奏（唱）團體，只有臺灣省教育廳交響樂團、XUPA 合唱團、中國廣播公司合唱團、中華口琴會、中華國樂會（中華民國國樂學會）、功學社樂器製造廠、中華民國音樂學會、遠東音樂社股份有限公司等在推行音樂方面的社會教育（游素凰 1996：96-97），可見當時社會上西方音樂環境的缺乏程度。

表 1 民國 54 年時推展西方音樂之重要機構團體一覽表

音樂機構名稱	地點	重要工作之推展
臺灣省教育廳交響樂團	師大運動場邊	定期演奏會
XUPA 合唱團	臺灣省廣播電台	1.定期廣播演唱。 2.參加省博覽會演唱。
中國廣播公司合唱團	中國廣播公司	1.配合廣播節目。 2.環島演唱。
中華口琴會	台北	設立短期口琴訓練班。
功學社樂器製造廠	蘆洲樂器工廠	民國 48 年 9 月創辦「功學月刊」。
中華民國音樂學會	台北市	1.蒐集整理流通音樂資料。 2.註釋翻譯歷代音樂曲籍曲譜。 3.獎勵協助音樂人才。 4.研究設計音樂問題與措施之興革。
遠東音樂社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推動國際間文化交流活動，引介外國著名音樂團體與藝術團體來台表演。

（表摘錄自游素凰 1996：96-97）

從上述種種證據顯示當時台灣雖然以西方音樂為音樂教育的主流，然而西方音樂學習環境的匱乏，促成了史惟亮返國後隨即展開籌組音樂圖書館的工作。

（二）民族音樂文化之失落

傳統音樂是民族音樂文化一個重要的環節，因此採集逐漸被煙氾的台灣民

謠音樂和保存下來是極重要的，而外國早已建立了無數的音樂圖書館和音樂博物館，為的也是這個目的（文學季刊 1978：151-152）。因此「保存和發揚民族音樂文化」就成為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成立目的之一。

台灣在日據時代，傳統音樂分別受到不平等的打壓，光復後，各類子弟社團、戲劇團體勃興。而民國三十八年政治性的大量移民，也帶來了各類大陸漢人的傳統音樂。因此民族音樂文化本應是大放異彩，為何會有失落的現象？分析當時社會環境，主要為社會轉型的衰微。生活型態之由農業轉為工商業，徹底地改變了原以民間自發性團體做為支撐的傳統音樂生態，生活型態改變之影響於傳統音樂生態的部分，有：

- (1) 人口間的大量流動，不利於以地緣關係為結合的傳統生態。
- (2) 重功利的價值觀與純寄情乃至花錢的傳統音樂活動之間有其根本矛盾。
- (3) 可以謀生的生活增多，經濟條件較好，傳統音樂、戲劇這類職業人口的來源較少（如自小至戲班學戲）。
- (4) 大量新型娛樂取代了舊有的休閒活動，而其間之衝突，不僅在於新舊，更在於步調節奏的快慢差異（林谷芳 1995：69-70）。

上述這些因素，使得傳統音樂文化急速的失落，這對於極為重視民族音樂文化的史惟亮來說是很大的打擊³；也加快他成立音樂圖書館的腳步。

四、創辦人之理想

「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創辦人史惟亮，民國三十五年進入東北大學，就讀歷史系，以興趣不合，醉心聲樂。三十六年轉學北平國立藝專（史惟亮等 1978：

³ 史惟亮曾為文「民族音樂文化的保衛與發揚」呼籲重視自己的音樂文化，他指出：想在音樂上恢復自我，首先要拿出自己的音樂來。中國人已經接受了五十年的新音樂教育，五十年來，我們學了外國的音樂文明，卻失了自己的音樂文化。豐富的民間音樂，正在中國人自己的輕賤棄置之下漸趨消衰，中國人對於自己的「民族音樂」失去了愛心和信心，談恢復自我，這是多麼艱難的奮鬥，豈只是主管機關一紙通令或一個座談會，一些口號所能奏效？最急切最重要的工作，是看看我們有多少音樂文化財，全大陸各省各族的音樂資料，全台灣山地和平地的音樂資料，立刻要蒐集、整理和統計，這個結果將會使我們自己大吃一驚，因為我們原有良田千畝而不自知，多少年來，我們竟是行乞度日！這句話沒有任何誇張，僅以我們在本省各地所採錄到的民歌為證，就足以使我們驕傲的說一聲「我是中國人」了（史惟亮 1978：15）。



47)。大陸淪陷，三十八年來台，成為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第一屆畢業生。畢業後遠赴西班牙馬德里大學音樂院、奧地利維也納音樂院、德國史托克大學學習作曲（史惟亮等 1978：141 - 142）。史惟亮在學習音樂的歷程上即是接受典型的西方音樂教育，雖然其一心想在音樂文化上恢復民族自信心，但迫於大環境的現實壓力 - - 西方音樂教育的主流，因此他回國後還是一直想給予社會大眾有更好的西方音樂學習環境，因而積極籌設音樂圖書館，也藉音樂圖書館作推展民族音樂文化的工作。

史惟亮於民國 47 年至 53 年留學歐洲期間，曾在馬德里、巴塞隆納、巴黎、慕尼黑、維也納等地，拜訪當地音樂博物館與圖書館，並隨在歐

圖 4 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左 2 為創辦人史惟亮
（史惟亮等 1978：封面內頁）

時間的增長與見識的增加，對國內需要一所音樂圖書館的感受愈來愈殷切。民國 51 年史惟亮重返維也納，主要目的即是維也納的圖書館裡有足夠藏書，得以提供他寫作「巴爾托克」傳記所需的材料。民國 52 年在德國斯圖佳城（stuttgart）參加「第五屆聯邦學校音樂週」講習會時，他見德國的音樂學術與教育俱發達，有感而發表示：西方在音樂上有極多飽學之士能做廣博而高深的學術研究，並不是他們智慧有何不同於中國人之處，而是因為他們有豐富的音樂圖書可供參考（孫芝君 2001：2）。

史惟亮留歐期間也和幾位助教、講師，共同組織了一個華歐學社⁴，共同研討東西方音樂的交流，同時他一心一意想回國後改善國內學習音樂的環境，為社會提供一個學習及欣賞音樂的良好環境。音樂圖書館一直是史惟亮所最關心的，他認為要成為一個音樂先進國家，必須先有一個頗具規模而可作學術研究的音樂圖書館（史惟亮等 1978：213）。

由上所述，台灣地區音樂資料館的籌設背景因素，為當時全球文化潮流上的

⁴ 華歐學社（Arbeitsgemeinschaft China-Europa）乃德國天主教聖言會下之一組織，史惟亮為天主教徒，華歐學社之組成又因史惟亮而起，成員俱為愛好音樂、有共同宗教信仰、並經常聚會、切磋音樂的朋友，因贊成史惟亮在台灣建立音樂圖書館的構想，而組成此一組織（孫芝君 2001：

西化，進而中國、台灣音樂的西化，表現在音樂教育的體制上也全面西化，雖然一片西化浪潮，但整個西方音樂的學習環境，在台灣地區也顯得貧乏。再加上西化浪潮聲中，社會生活型態的轉變、政府的國語政策、經濟生產結構的變化，造成傳統音樂文化的失落等背景因素外，史惟亮在留學歐洲期間所見所聞，引發他的感觸與理想進而具體的去實踐，更是台灣地區第一所音樂資料館成立的重要關鍵。

第二節 發展歷程

台灣第一所音樂資料館在整個發展上主要分為兩個時期，一為初成立時的「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時期，另外即為創辦人史惟亮過世後，重新籌組更名為「史惟亮紀念音樂圖書館」時期，以下即以這兩個時期作為發展歷程的描述。

一、「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時期

「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於民國五十四年八月三日開放，從建館於台北市敦化北路台北學苑內開始，「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時期即遷移了三次館址，民國五十八年因為經費與其他種種原因，音樂圖書館離開台北學苑，搬到史惟亮個人在四維路租的房子，從此開始就較少對外開放。民國六十二年史惟亮接任國立藝專音樂科主任，又將音樂圖書館遷至國立藝專，這段時期，可說是音樂資料受損最嚴重的時候⁵。

（一）成立目的

史惟亮指出「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設立目的為：

- 1、補足今日學校音樂教育之不足。
- 2、以圖書館為中心展開一個青年音樂運動，使青年接近音樂，享受音樂，自音樂中獲得快樂及勇氣，獲得愛與安慰。有正常的休閒生活，養成合群愛國的情操。
- 3、在音樂上溝通中西，圖書館以充實圖書唱片為主要任務，並以與其他國家音樂文化之交流作為工作之一。
- 4、保存和發揚民族音樂文化（史惟亮 1965：43）。

（二）籌組經過

史惟亮為主要發起籌備人，在德國華歐學社和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協助下

⁵ 史擲詠訪談紀錄。

合力創辦，以及在傳播媒體的刊登報導呼籲下，透過各界金錢或實際設備、物資的贊助下籌組起來。

1. 華歐學社捐助音樂資料

民國 53 年，史惟亮和幾位歐洲學音樂的講師、助教，共同組織了一個華歐學社，一起研討東西方的音樂。大家認為中西音樂交流是件可喜的事，都同意史惟亮的理想，在台北創辦一座音樂圖書館，他們大力一呼，德國社會人士群起響應，捐集了重達四百公斤（良爾 1978：143-144）價值新台幣十萬元的德文音樂書、樂譜及唱片（許常惠 1991：355），作為史惟亮回國辦音樂圖書館的第一批圖書。民國 54 年間華歐學社為協助我國出版音樂書籍與樂譜，匯來新台幣三萬元，由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與新竹廣音堂合作出版中國作曲家作品（劉世武 1965：第 8 版）。

2. 青年救國團提供使用場地

史惟亮留歐將要回國的時候，從西德寫了封信給當時青年救國團的副主任李煥，他說「在德國募集了一批很有價值的音樂方面的書籍，預備回國成立一個音樂圖書館，以推展國內的音樂活動，估計需要二十萬元添置必要的設備，還需要一個場所，希望你的幫助」。在救國團經費很困難的情形下，毅然的撥給他二十萬元作開辦費，支持音樂圖書館的建立，並指定臺北學苑的一大間集會室供作場所。於是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有了初步的規模（姚舜 1978：2）。

3. 國內各界捐助資料、設備

史惟亮曾在報章上指出希望社會各界給此一國內第一所音樂圖書館以充分支持，他呼籲大家如有剩餘不用的中外音樂圖書，能多多捐贈，使這一所草創伊始的音樂圖書館，逐漸充實，奠定良好的基礎。

當創館成立籌措時，協助的單位計有：中國音樂學會協助之下獲得美國亞洲學協會撥贈一部份書籍；美國新聞處、日本全音出版社捐贈書籍；台灣省交響樂團捐贈舊樂器一批供陳列；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借用一批音樂圖書；台灣電影製片廠的一部份電化器材分別以贈送與借用的方式，供給該館；另有很多書店捐贈有關音樂書籍。（聯合報 1965/8/2：第 8 版）。

(三) 經營概況

1、服務對象

個人借閱可繳保證金，音樂科系學生可團體借閱，由系科辦公室出具證明。外埠讀者可通訊借閱。

2、開放時間

初期開放時間為每天下午五時半至十時，星期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每逢星期四休息。民國五十七年時開放時間是每星期三~六下午二時至六時，星期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六時，星期一、二兩天休假不開放（愛樂音樂月刊 1969：10）

圖書館遷往四維路後之開放時間為每星期二、三、六下午七時至九時，星期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愛樂音樂月刊 1970：10）。

3、館藏

開放之初，即民國五十四年八月，包括中、日、英、德四種文字之音樂著作及各種樂譜（尤其有關現代音樂之樂譜），擁有書譜逾千冊，唱片四百張（史惟亮 1965：43）。民國五十五年三月發表的數量，藏書已達二千五百冊，唱片達五百張（史惟亮 1966：149）。

民國五十六年該館當時圖書已達三千卷。圖書除珍貴圖書及辭典、參考書、音樂期刊外，都已編成目錄，開放外借。外借目錄分訂兩冊，計三千冊，內容分：音樂理論知識、音樂傳記歷史、歌劇、室內樂、藝術歌、合唱、音樂教育、民間音樂、獨奏曲、編曲、清唱劇、宗教音樂、管弦樂、雜類、各類（音樂學報 1967：24）。民國五十九年已藏有音樂書譜逾三千五百冊，唱片七百張（愛樂音樂月刊 1970：10）。

4、空間、器材設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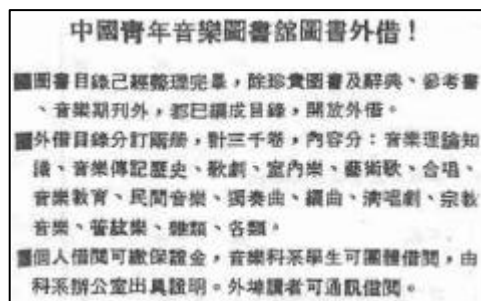


圖5 「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圖書外借公告（音樂學報 1967 第 2 期：24）

空間的運用及其內部設施分配如下：

- (1) 研究室：陳列著各種樂器，供給研究之用。
- (2) 閱覽室：定名為光祈室，用以紀念中國第一位立志溝通中西的音樂學者王光祈，鼓勵青年人學他的求真知、立大志、苦學、愛國的精神（史惟亮 1965：43）。陳列著各種音樂書籍及資料供人閱覽，有一台電唱機及唱片。
- (3) 欣賞室：陳列著鋼琴及沙發椅和自閱覽室接過來的電唱機喇叭（功學月刊 1965：20）。



圖 6 「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閱覽室（功學月刊 196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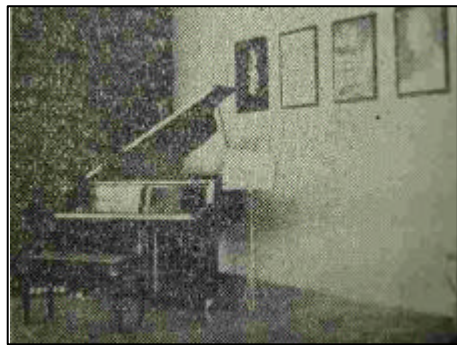


圖 7 「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欣賞室（史惟亮 1966：148）

5、教育推廣活動

(1) 組織合唱團

除一般圖書服務外，並與具有豐富合唱經驗的青年，籌組以演唱本國民歌為主的“小路合唱團”，提倡中國人多演唱中國音樂（史惟亮 1965：43），於民國五十四年九月初正式成立練唱（聯合報 1965/8/12：第 8 版）。

「小路合唱團」成立以後，又與若干音樂教師發起再組織一個純以音樂教學為目的的音樂教師合唱團，希望透過這個合唱團的各種活動，能在中小學的音樂教學上起示範和鼓勵作用。「音樂教師合唱團」保持一個研究的性格，參加該團的音樂教師，輪流在每次練習中擔任主持人，以合唱為主要活動，互相觀摩學習（聯合報 1965/8/29：第 8 版）。

(2) 出版刊物、書籍

在出版音樂著作方面，史惟亮依讀者性質，將出版品分為：推廣性音樂著作與學術性研究著作兩大類，逐一推動出版。前者如「中國青年音樂圖書

館主編第一、二套音樂叢書」⁶與「希望音樂叢書」⁷分別邀請專家並公開徵求寫作有價值之音樂著作，由愛樂書店刊行（史惟亮 1966：150）。學術性的研究著作，則以民國 56 年 1 月開始編輯出版第 1 至 12 期之《音樂學報》最具代表性（孫芝君 2001：9），然於發行十二期即停刊。

(3) 舉辦定期的音樂欣賞會及不定期的音樂會（史惟亮 1966：150）

(4) 寒暑假舉辦音樂教師進修會，教師們可利用館內音樂設備自由進修，並由圖書館聘請音樂家作專題報告（史惟亮 1966：150）

6、收費服務

(1) 供給練習鋼琴

購置鋼琴等樂器，不限年齡及學習程度，排好

時間供給對音樂有興趣的青年來練習，人人一律收取小額會費，家境清寒者免費，申請練習時間為每日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史惟亮 1966：149）。

(2) 代為抄譜⁸

圖書館於五十四年十月購入一架美製的打譜機，有專人負責打譜較手抄準確快捷，能以手抄所需三分之一的時間（即一小時）打完一張譜（即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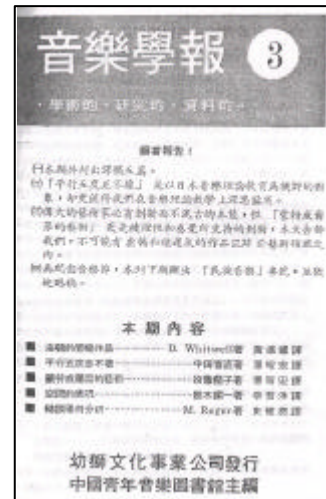


圖 8 音樂學報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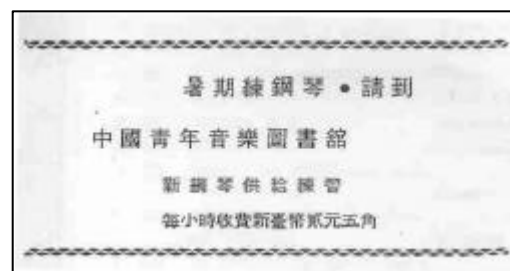


圖 9 「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提供練習公告（音樂學報 1967 第 8 期：16）

⁶ 第一套音樂叢書五本由幼獅書店印行：《指揮的藝術》1968 方鳳珠譯、《民族音樂家》1967 許常惠著、《畫中的音樂歷史》1969 音樂圖書館編、《論音樂形式》1967 史惟亮著、《論民歌》1967 史惟亮著。第二套音樂叢書：《帕德雷夫斯基自傳》幼獅書店印行 1969 陳淑珠譯、《法雅傳》希望出版社出版曾道雄著、《巴爾托克傳》史惟亮著。（孫芝君 2001：18）

⁷ 希望出版社從 1971 至 1972 年間陸續出版「希望音樂叢書」十二冊：《巴哈》（史惟亮著）、《貝多芬》（史惟亮著）、《舒伯特》（劉塞雲著）、《杜步西》（許常惠著）、《巴爾托克》（史惟亮著）、《巴哈》（史惟亮著）、《音樂的形式和內容》（史惟亮著）、《民族樂手 - 陳達和他的歌》（史惟亮著）、《韓德爾》（史惟亮著）、《海頓》（王沛綸著）、《舒曼》（史惟亮著）、《威爾第》（李振邦著）、《帕德雷夫斯基自傳》（陳淑珠譯）。（孫芝君 2001：20-21）

⁸ 當時手抄譜每頁代價已達新台幣五十元，而抄譜時間每頁達三小時以上（功學月刊 1966：25）。

簡單的歌唱及伴奏譜)，且費用也較低廉（功學月刊 1966：25）。

（3）代為訂購各外國版音樂書籍（史惟亮 1966：149）。

（4）唱片欣賞：任由讀者選擇，酌收消耗費（史惟亮 1965：43）。

二、「史惟亮紀念音樂圖書館」時期

史惟亮於民國六十六年辭世後，由數位音樂界人士成立「財團法人史惟亮紀念音樂基金會」，並將「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改組為「史惟亮紀念音樂圖書館」，並於民國六十八年將館遷至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 2 號中央大樓 966 室，民國七十八年遷至台北市和平東路 3 段 63 號 7 樓；民國八十五年結束對外開放，並將資料搬至台北市和平東路 3 段 63 號 12 樓存放，而今這批資料由其家人保管中⁹。

（一） 基金會的成立

史惟亮於民國六十六年初因病去世，音樂界決定成立基金會，來鼓勵人才，提倡民族音樂，經過多方奔走，台中冷凍業企業家郭頂順慷慨捐出二百萬元，基金會才得成立，當時基金會人員包括董事長郭頂順、董事鄧昌國、姚舜、張慶凱、趙岳山、陳延鎧、許常惠、劉塞雲、游昌發、李振邦、史擲詠、陳秋盛、高士嘉等（音樂風雜誌社 1978：60）。

基金會的主要機構是「史惟亮紀念音樂圖書館」，由於史惟亮生前為成立音樂圖書館多方奔走，遺囑之一也包括將他自己的書成立圖書館，這個圖書館以保存民族音樂資料和推動民族音樂有關活動為主，館長是李振邦神父。基金會於民國六十七年三月起籌備，六十八年二月開放社會民眾使用（國立中央圖書館 1988：42）。

（二） 經營概況

以當初成立的概況來看，當時主要工作人員有二人，館舍面積 50 平方公尺、座位 10 席。經費主要來源為基金會的基金二百萬元，以每月 46,000 元的利息支

⁹史擲詠訪談紀錄。

應。閱覽時間每星期 42 小時（星期一、三~日 10：00~17：00），館藏圖書 5,000 餘冊、唱片 200 餘張、錄音帶 100 餘捲及音樂雜誌，分類編目的方法為自訂（分理論、樂譜、管弦樂譜、聲樂用譜、普通音樂書等），主要的推廣服務為演講會（國立中央圖書館 1988：42-43）。

台灣地區第一所音樂資料館進入「史惟亮紀念音樂圖書館」時期，在活力上遠比不上「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雖然有對外開放，但因為地方實在是太小了，學生真正利用它來找資料的少，所以淪為學生暑假利用在那裡 K 書的地方。而變得很難管理，而且只有一個人在現場管理，而且由於在地點上是位於大樓內，令人覺得很封閉。此時音樂圖書館較屬於一種私人狀態下在走，也就是一種不是公諸於世的；較少對外開放的¹⁰。

三、結束營運的問題探討

（一）經費來源

從「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營運初期，經費的來源就一直是個問題，雖然音樂圖書館在某些方面屬於收費服務，但這些零散的收入並不足以維持一個圖書館的經常開支。許常惠就曾指出：民國五十七年史惟亮再度出國。這一年，我受他的委託代理了音樂圖書館的館務。民國五十八年史惟亮回國後不久，因為經費與其他種種原因，音樂圖書館與民族音樂中心都離開臺北學苑，搬到他個人在四維路租的房子（許常惠 1987：147）。

後來「史惟亮紀念音樂圖書館」時期，因為資金只能保持在運用利息，基金不能動的情況下，沒有任何捐贈，資料也沒有增加，房價也越來越高，因此資金不符開銷的困境影響到營運管理的作業。差不多一直到民國八十五年，利息入不敷出，再也沒辦法支撐一個圖書館狀態的運作，然後就把書收藏起來，因為它已經變成基金會運作存在，但是書已變成了基金會的財產了，它不再有能力作為一個開放空間，只能作為財產、資產。因此，目前基金會本身還在運作，主要是維

¹⁰ 史擷詠訪談紀錄。

持每年辦理表演活動或贊助演講活動，但還是看財力的多寡而決定活動的頻率¹¹。

（二） 基金會運作失常

基金會經營上的困難在台灣是很普遍的現象，陳煥昌與吳成豐就曾以國內的各類基金會為研究對象，指出各基金會普遍遭遇經營上的困難，其排名依序為：

（1）社會各界的贊助態度與反應不熱烈；（2）政府規定或限制過繁；（3）員工普遍缺乏使命感；（4）基金會缺乏財務自主性；（5）贊助單位或捐款人提出要求或條件；（6）所舉辦的活動過份泛政治化。尚有部分基金會遭遇較大經營困境都圍繞在人力資源的管理上如：（1）人員多為兼職或義務性質流動性高；（2）專業及專職人才缺乏；（3）經費不足、人力缺乏；（4）義工招募不易（陳煥昌、吳成豐 2000：8-9）。夏傳位也曾指出：台灣的基金會大都是由企業出資成立，和美國大都由個人慈善家和捐款大眾出資成立的晴況不同。而國內的企業基金會，又大都傾向自行運用捐款、很少讓專業機構代理，經常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和執行能力；誤以為慈善事業等同於愛心救濟，不需要很強的專業能力，或不習慣假手他人，缺乏相互制衡、監督的概念（夏傳立 2000：238）。

「史惟亮紀念音樂圖書館」是隸屬於「史惟亮紀念音樂基金會」，基金會的董事會成員都還來參與會議，可是比較流於形式化了，且近年來成員都太忙碌了，兩年開不成一次會，人也在漸漸的減少，因此運作也更形困難，漸漸造成基金會的失常現象¹²。

¹¹史擲詠訪談紀錄。

¹²史擲詠訪問紀錄。

第三節 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對音樂界的影響

回顧台灣地區第一所音樂資料館的發展歷程及其經營，從「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時期，發起的民歌採集及運動、支援中國民族音樂研究中心、推展社會音樂教育、倡導研究音樂學術、出版國人音樂著作，留下《中國音樂作品全集》《音樂學報》《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主編音樂叢書》《希望音樂叢書》等深具拓荒性質的音樂著作，為當時尚在混沌中的臺灣音樂環境，點上一點燭光(孫芝君 2001：15)。

「史惟亮紀念音樂圖書館」時期經營的狀況，則遠不如「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時期的活力四射，主要活動則在於音樂欣賞會、演講會等教育推廣活動。茲從以下三方面來探討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對音樂界的影響：

一、民族音樂文化之推展

發揚民族音樂文化一直是創辦人史惟亮的理想，因此創辦音樂圖書館的目的之一，即是保存和發揚民族音樂文化。表現在具體的行動上，即為發起「民歌採集運動」、舉辦相關之演講、欣賞會、「中國民歌比賽」等教育推廣活動。延續至「史惟亮紀念音樂圖書館」時期，則以民族音樂文化相關之演講、欣賞會為主。

國內第一所音樂資料館「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雖然名之為圖書館，但工作重點乃在整理中國民族音樂的工作上，而後來大規模的“民歌採集運動¹³”，實際上是從這個圖書館逐漸展開的(許常惠 1987：21 - 22)。民國五十五年一月開始，當時參與“民歌採集運動”的工作者以錄音採集方式，做了一次台灣民族民間音樂(以民歌為主)的概況性的調查，「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便成為這次運動的根據地，也是資料存放的地方¹⁴。至五十六年另成立“中國民族音樂研究

¹³ 「民歌採集運動」是由史惟亮與許常惠發起的，他們兩人感到：一方面中國現代音樂的創作，深切地需要以民族音樂的傳統做為泉源，另一方面本地民族音樂遭到愈來愈嚴重的冷落與破壞，因此發起了民族音樂的搶救工作。民國五十五年一月至五十六年八月，在台灣共採錄了兩千首以上的平地與山地的民歌，可以說自鄭成功驅逐荷人開拓台灣以來，中國人在台灣所做的最大規模和最有系統的民族音樂的採集工作。(許常惠 1991：326)

¹⁴ 他們採集民歌的組織，由於得不到經濟支援而解散了。採集來的資料，由史惟亮移到幼獅音樂圖書館(即為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當時場地為救國團所有，因此有些人即如此稱呼)保存

中心”¹⁵，才把民歌工作與圖書館工作分開（許常惠 1991：95）。

全部採錄的原住民民歌達兩千首，這一次的民歌採集工作，並非臺灣有史以來的首次，本省在清代和日本統治時期，已經有人先後從事過民歌採集工作，不過這些採集工作，所得資料大都是不完整的，或是由於文學的目的，或是民俗的研究。日本音樂家黑澤隆朝，民國三十三年曾來台灣，實地採錄了相當數量的「民歌」，但僅以原住民各族的民歌為主，與這一次採集的目的和意義大有差異。根據史惟亮的觀點，這次採集的意義為：

- （一）當時本省居民多係漢族，共佔總人口 98%，其餘是原住民約佔 2%。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其他省籍來台的，約為客家、閩南人的 20%，各地風俗殊異，民歌各有不同。這時的採錄資料自有其不同的風格。
- （二）當時台灣光復二十年，工商業發展極為快速，農業也已發展到工業化的邊緣，如此一來，城市和鄉村生活方式的差距都日漸縮短，文明越發達，民歌就越衰退，站在歷史的保存立場，這些散在民間的民歌，必須趁早整理出來，以保存台灣音樂文化的歷史。
- （三）西樂大量東來，想恢復民族靈魂，必須先有自己的民族音樂，而採集民歌正是建立民族音樂的第一步（史惟亮等 1978：33-37）。

如今這一批當時採集的民族音樂資料，有些已由史惟亮、許常惠等研究發表，然而大部分並未研究發表。民國八十九年經許常惠重新整理，已部份製成 CD 出版。而留存於圖書館的部分，因年久不易保存。經史惟亮的兒子史擷詠，將其送往英國，已重製成一百多片 CD。史擷詠打算與國內外相關基金會合作，計劃未來將再循著史惟亮當年的足跡錄製影像，作為其所設立網站¹⁶之「中國音樂庫」的有聲資料庫，提供專業媒體上網下載參考（施美惠 2000：32 版）。這些

去了（陳怡真 1978：137）。

¹⁵ 民國五十六年由史惟亮、許常惠、范寄韻、李玉成及陳書中等人發起「中國民族音樂研究中心」。民族音樂工作由史惟亮和許常惠擔任，范寄韻與陳書中處理事務及財務。中心最初設立於「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內，後來搬出台北學苑，另租屋苦撐了一年，終因經費而停止工作。「中國民歌比賽」及「民歌採集運動」都是由該中心推行的（許常惠 1991：355-356）。

¹⁶ 此網站為「普飛音創體」<http://www.profee.net>，此一網站主要架構包括訊息面、音樂人、事業體、聲音舞台與中國音樂庫等。

當時「民歌採集運動」所蒐集的資料，現在應可拜科技之賜，一點一滴的提供民族音樂文化研究的重要參考。

二、社會音樂教育之強化

從「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時經營的重點，提供練習用琴、提供音樂團體練習之場地、組織合唱團，舉辦音樂講座、展覽、音樂會節目等，提高社會大眾接觸、欣賞、學習音樂的機會，以當時稀少的音樂機構而言，對推廣、普及音樂教育達到相當程度的作用。

三、音樂學術研究之提升

「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充實館藏，在於提供學術研究的環境；出版中文書籍，意在透過研究成果，創造學術研究的風氣，帶動音樂界學術研究的良性發展，亦即其所謂「創造出一個充足而必要的條件出來」，庶幾達成「保存和發揚民族音樂文化」的目的，再以這些成果，回饋襄助他創辦音樂圖書館的西方社會¹⁷，達成「在音樂上溝通中、西」(孫芝君 2001：9)。

當「中國青年音樂圖書館」成立之時，為當時國內音樂資料最多之處所，也是當時擁有最完整音樂期刊資料之處。史惟亮曾很自豪的說，有關音樂方面的藏書多於國內的任何一個音樂圖書館；也曾很感慨的說，目前國內的音樂水準及風氣，還不夠格有一個音樂圖書館(史惟亮等 1978：213)。現任中國文化大學教授彭聖錦即曾指出，民國六十年就讀研究時，由史教授指導，即在此圖書館獲得充分資料，也受史教授影響開始蒐集、保存資料至今(彭聖錦 1997：127)。

以音樂教學為目的的「音樂教師合唱團」，透過這個合唱團的各種活動，在中小學的音樂教學上起示範和鼓勵作用。參加該團的音樂教師，輪流在每次練習中擔任主持人，以合唱為主要活動，互相觀摩學習。這種保持研究的性格，有別於一般的社區合唱團只是把合唱當興趣休閒的生活陶冶，對於當時合唱教學的技

¹⁷ 民國五十七年他再度赴歐，協助主持一所波昂大學的中國音樂中心，在那裏他展出了中國樂

術不無幫助。

器、平劇資料、山地音樂等，幫助異邦人士，了解中國音樂（高士嘉 1978：47）。